

德国战后 经济史

[德] 维尔纳·阿贝尔斯豪塞 著

史世伟 译 冯兴元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德国战后 经济史

[德] 维尔纳·阿贝尔斯豪塞 著
史世伟 译 冯兴元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3-353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战后经济史：德文 / (德) 维尔纳·阿贝尔斯豪塞著；史世伟译；冯兴元校。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203-2633-9

I. ①德… II. ①维… ②史… ③冯… III. ①经济史-研究-德国-现代-德文
IV. ①F151.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778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31.5
插页 2
字数 562 千字
定价 11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以庄严之心献出这本书，确信它有朝一日能被那些为之而写的人发现，并泰然接受其无例外的命运，最清楚的认识莫过于，真理永远只在长期被斥为悖论或者被低估为平庸之说间的短暂时段里取得胜利。

——阿瑟·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

序 言

1945 年以来的德国历史首先是一部德国经济史。相比其他方面，经济发展对联邦德国（西德）社会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没有哪个国家比联邦德国的经济成就更为显著，这些都归功于联邦德国政局稳定和政府行动自由——而这也是魏玛共和国所缺少的。为了实现重建西欧之目标，联邦德国及其经济也日渐强盛。与此同时，民主德国（东德）——彼时的苏联占领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其经济上将取得非凡成就的预言息息相关。创造财富、获取实实在在的物质成就并不仅仅是其设定的意识形态的目标，它同时还是东西德社会体系对比竞争中的关键标准。由此可见，民主德国最终败在经济问题上也在情理之中。

与此相反，在谋求政治存在目标的过程中，联邦德国长期成为经济成就显著的化身。经济飞跃不仅为国内民主的稳定和发展以及第三帝国法定继承人的国际再社会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它更是成为整个西德“民族”自我认同的动力或者说至少是其国家身份的标签。从 1945 年的视角来看，这是一次令人惊讶的转折。因为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物质困境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历经灾难的国民对国家的发展有所希冀，他国作为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对德国经济的走向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期待或担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联邦德国取得的经济成就超乎所有人的想象。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解决经济问题的探索中，联邦德国选择的道路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随着 1948 年经济改革的实施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引入，德国人也认为自己走上了一条远离危机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在外人看来，西德的“经济奇迹”首先不过是国家的幸运以及国民聪明能干和勤奋工作等因素机缘巧合的结果。社会市场经济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不是什么输出品。在 60 年代后期工业国家的“不可治理性”（Unregierbarkeit）成为时尚词汇、西方民主制度内部社会利益的平衡协调举步维艰的情形下，

“德国模式”才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它经受住了 70 年代世界市场的种种考验并向世人证明,在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德国模式拥有比其他国民经济体更为完善的“武器装备”。彼时的德国总理也一举摘得七国集团峰会“世界经济学家”的称号。早在 90 年代初,“莱茵模式的资本主义”(Rheinischer Kapitalismus)就成为德国享有盛名的“注册商标”,赢得了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推崇。^①恰恰是拥有一定历史积淀的德国经济组织为德国经济优势与社会优势的相互结合提供了保障,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获得盛赞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奇迹”(暂时的)的勃勃生机与活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早年的经济成就在西德为平衡社会群体间利益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德国人根深蒂固的协商意愿和社交能力没有为德国的经济成就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吗?难道这些就不是如今德国经济顽强挺过危机并在世界市场上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原因吗?

对于深刻理解战后德国经济重振雄风的过程而言,德国经济史的意义自然不在话下。然而,它究竟始于何时?1949 年 5 月 23 日,西德国家建立,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作为议会委员会主席颁布了德国《基本法》。这一众所周知的史实却不能帮助我们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德国经济走向的经济秩序设想早在这一事件之前就已存在。即便是被众多人士视为联邦德国成立之日(这一天也是东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开端)的 1948 年 6 月 20 日也不足以成为德国战后经济史的起始日期。“前货币时期”(Vorwährungszeit)绝不仅仅只充斥停滞与混乱。1945 年至 1948 年,各占领区罔顾民众商品短缺疾苦大肆开展经济重建,对德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德的重建工作比原计划开展得更早。联邦德国经济史的起始之年应是 1947 年——发生了“瘫痪危机”(Lähmungskrise)和“千卡路里”(Tausend Kalorien)之年,采煤业和爱心包裹(Care-Pakete)繁荣兴起之年,重建战争中毁损基础设施和重填仓储之年,而并非实施货币改革、内部市场自由化及“马歇尔计划”的 1948 年。因此,东西德经济史发展历程自然也就包括了这段“预产期”。

战后德国的经济主导绝不仅限于经济重建和经济奇迹时期。时至今日,经济问题在公众舆论中依然占据着不小的分量,对某些领域的意义甚至比以往更大。如果经济依据事实的确定性长期以来有助于弥补战后德国政治及文

^① 参见米歇尔·艾伯特《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Michel Albert, *Kapitalismus contra Kapitalismus*, Frankfurt/Main, 1992)。

化自我意识的不确定性，那么今天，经济也会并正在被纳入德国人的自我认同危机中。即便是已寻求到完美解决方案的民族问题又重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所有人都未曾意料到的。大规模重建投资带来的收益事先并不可知。只有当德国经济模式恢复有效运转并随之推广覆盖到整个德国时，才能称为成功。虽然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这类改革的必要性就已十分明确，政界与科学界的有关专家对此也早有预判，然而东西德的重新统一并未加快改革的进程，而是延缓了其目标的实现。仅从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看出，让“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的领袖重新适应并遵守社团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游戏规则注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这一复杂的经济模式只有在所有参与者的协调配合下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率潜力。金融市场危机的经验是否影响并以何种方式影响这一进程，是目前最牵动人心的问题。

在当今的欧洲，德国的经济地位相比其政治或文化地位而言要更胜一筹。不过，这并非一直如此。至少，《罗马条约》诞生的历史清楚地告诉世人，相比功能上的经济压力而言，原则性的政治决议对欧洲融合道路的选择和拓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推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的并非经济利益的博弈，而是出于生存安全以及防范外来侵略实现独立自主的政治的考量。在历史进程中，政治诉求显然是放在首位的。然而，要让经济史学家承认这一点却并非易事。为了抓住欧洲问题的主要矛盾，这一点认识是十分必要的。欧洲人要想捍卫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同一性，就不应该仅仅依赖内部市场的融合力。20 世纪 60 年代而言，如今的世界经济对经济决策体系的影响更为深远，（全球）经济的发展愈加成为阻碍欧洲融合的离心力。在此过程中实现欧洲政治有益功能的动机如今也日渐缺失。货币联盟和东部扩张虽然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经济融合的框架条件，然而却将政治统一这一基本问题抛在脑后。它甚至打算跳过欧洲文化的历史长河和“欧洲特性”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几乎所有事实都证明，要想在更广阔的欧洲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实属不易。对世界贸易大国德国而言，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德国能否适应货币联盟的客观要求融入欧洲经济的综合体中，能否将更广阔的内部市场视为实现其国家经济、政治目标的根基。在这个过程中，德国是否愿意——能否承受——为了欧洲融合的利益而牺牲本国的优势，尤其是其社会生产体系的比较制度优势，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用自身的竞争力为欧洲的自我复兴服务。这一决定的后果已超出狭隘的经济利益范畴，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我们将如何在德国和欧洲生存与发展。

有关德国战后经济史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十年后，出现了许多

争议问题，对这些问题认知完全超出了专业范畴。^① 有关“经济奇迹”的根源及其模式特征自然就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② 在对西德经济和经济政策道路普遍的茫然不知所措的背景下，需要弄清楚的是：战后时期积累的经验究竟只是历史舞台上一段无关紧要的小插曲还是代表着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政策创新的新标准？德国能否找到重返“经济奇迹”美好年代的方法？在那里所有社会变迁的牺牲者都获得了应有的物质补偿。倘若抛开贯穿 50 年代的创纪录的标志，又该用何种历史标尺来衡量德国经济的成就？如今这样的议论声依旧此起彼伏，80 年代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并未过时。这些都与有关“经济奇迹”根源的分析密切相关。如今的经济史学家能更透彻、更广泛地理解这一根源。但是在公众舆论界——尤其是在世界的那些政治中心——仍然流传着一些有关这一根源的天真的、有失偏颇的观点。那些渴望为非洲、中亚或巴尔干半岛实施“马歇尔计划”的人士几乎都无法真正理解其内在机制。德国经济于 1945 年崩溃且涣散了，但德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欠发达”国家。

有关 1945 年以后经济史的早期研究结果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得以坦然问世。“马歇尔计划”最先带来的并非是直接的经济效应。这一点虽并未抹杀其在西欧重建特殊框架条件下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却降低了它被应用于解决其他发展问题的普适性。有人认为，1948 年的货币改革还不足以用来解释德国的“经济奇迹”。但他们也并未否认改革实施的必要性并尽量避免对东西德货币联盟之影响进行有失偏颇的评价，而这在 1990 年西德政界中十分普遍且常见。探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比起理解其具体内容而言要容易得多。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政策的口头承诺和全球极端市场化复兴进程的中和剂越来越受到政界人士——甚至其早期批判者——的欢迎，但在德国人集体记忆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空白。人们或许会对西德重拾社团利益政策和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正如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朝鲜危机期间发生的那样——从自由主义教义视角进行谴责或从务实主义角度进行夸赞。不过，这一事实本身却无法被人们忽略和淡忘。

① 沃尔夫冈·詹克（Wolfgang Zank）于 1988 年在《时代》（*Die Zeit*）杂志上将这一现象称为“经济史学家大争论”（*Wirtschaftshistorikerstreit*）。见其文章《奇迹无法避免》（“Das Wunder ließ sich nicht vermeiden”，in: *Die Zeit*, Nr. 26, 24. 6. 1988），第 25 页及其后。

② 我的有关《德国战后经济史》（*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1980*, Frankfurt a. M., 1983）一书也是如此，它总共再版七次。在苏尔坎普（Suhrkamp）出版社出版之前，新历史图书馆出版了本书的第一版。

其他早期的研究成果则是对叔本华法则的有力证明。^①在他看来，每一种理解和认知的胜利都仅仅是昙花一现——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两段很长的时期里，它被世人斥责为悖论或被贬低为平庸之论。曾有不少人认为，作为战争轰炸的后果，德国经济是从零起点开始的。难道今天依然有人质疑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吗（难道今天还有人对此一论断的错误性心存疑虑吗）？人们可能会对重建效应的规模问题争论不休，却不会怀疑经济特别增长条件本身的作用。这些条件深深地影响着 20 世纪 50 年代的经济的发展，以后也再未出现过类似情形。德国的生产潜力没有遭到摧毁（与谋杀性空战所针对的城市居住区不同），其生产机械也没有老化或技术落后于他国。如今，这一叔本华意义上“平庸的”认识和观点仍然是理解德国战后历史不可或缺的工具。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人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国家经济政策的潜力和界限究竟何在？德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有哪些？德国在世界文化竞争中的地位如何？金融领域对整体经济产生了哪些越来越深刻的影响？金融领域对国际国内发展的稳定产生了以及会继续产生哪些后果？因此，《德国战后经济史》最新再版必须要跟上过去这几年的研究成果与问题焦点，这一点从本书日渐增长的页码即可看出。扩展的内容当然并不仅限于增加一个额外的章节，事实上，笔者对几乎所有章节的文字（从第四章开始）都进行了修改，并从当今的视角出发扩展了相关内容。书籍能够再版也引证了亘古不变的原则：书的内容带给读者比书的标题更多的惊喜。由于 1945 年并不是德国经济的零起点，因此，如果一部德国经济史没有包括自 19 世纪后期国家形成的基本特征，那么这本书就会十分难以理解。这一点也适用于欧洲，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它与德国经济史紧紧相连，密不可分。上述两方面内容的扩展不仅限于个别章节，而是贯穿于所有相关的领域和主题。

这些也同样适用于分析民主德国经济衰败的原因。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反对将东西德分裂的那段历史笼统地看成一个时期。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1947 年至 1990 年并不存在统一的“德国经济史”。故而有关民主德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就应运而生，而这也并非仅仅出于地域原

^①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1. Band, Vorrede zur 1. Auflage, 1818; 3. Aufl. Leipzig 1859），第 XV 页。

因。民主德国的经济史需要得到符合其独特条件和意图的适当关注。^①然而，民主德国曾经创造的经济成果仅有极少部分流入德国经济的精髓中。^②因此，对于1990年以后的德国经济史而言，其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这里我们仅考虑东德经济史中那些对理解德国经济发展有历史意义的和对统一后的德国经济前景仍然重要的部分。

历史描述究竟允许自己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贴近正在发生的公众争论过程？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并非易事。经济史撰写的比较优势不是首先在于介入到具体问题解决方案的现实争论之中。因为，每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领域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并与参与者的精神世界和当时的制度背景息息相关。如果对现实问题的时间、空间和社会联系视而不见，改革必将归于失败。为了检验普适性观点的经验相关性，历史研究亦是必不可少的。倘若不考虑备受争议的社会生产体系所处的历史背景，诸如“劳动‘成本太高’致使劳动力市场出现失衡”等有关经济改革争论的陈词滥调极易成为毫无意义、流于形式的理论说辞。如果类似论据具有普遍适用性，发展中国家早就能够摆脱落后状态，实现完美的蜕变。巴里奥斯·加拉加斯（Barrios von Caracas）提到的“充分就业”也能成为衡量经济状况健康与否的指标。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因此，为了在实践中获得相关的经济理论并探究经济决策的回旋余地和未来走向，经济史的撰写还必须介入现实的争论。一般而言，通过引入简单事实的方式就可实现这种介入。在德国，并非工作本身很昂贵，而是劳动力市场上不合格劳动力的比重过高，这也是福特主义时代留下的弊病，从而导致进入非物质生产时代的适应成本过高。

漫长的20世纪的德国经济史绝不可陷入仅从理论上解释得通的经济实际压力的内在逻辑来发展经济事件的基本轨迹及支持它的基本决策的巢穴中。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针对德国经济与欧洲和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正是在1945年以后德国经济的重要性日渐上升。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

① 正如在安德里亚·史泰勒（André Steiner）的书中所提到的那样。见其书《从计划到计划：民主德国的经济史》（*Von Plan zu Plan, 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DDR, München, 2004*）。

② 我们不需要像汉斯·乌尔里希·维勒（Hans-Ulrich Wehler）那样深究到如此程度，他将民主德国仅仅看成是《德国社会史》（*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一书的一个脚注而已。对此可参见其《联邦德国模式——民主德国是其脚注？》（“Modell Bundesrepublik-Fußnote DDR?” in: *Bundesrepublik und DDR, Die Debatte um Hans-Ulrich Wehlers,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hrsg. v. Patrick Bahners und Alexander Cammann, München, 2009），第73—91页。

转折并没有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遵循理性的经济博弈理论。因此，尽管从专业角度来看，对经济持续性因素和经济结构的研究更能牵动经济史学家的神经；然而，在寻求经济史决定因素的过程中，我们也应对有关偶然性和重要事件的研究给予同等耐心和细致的梳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和欧洲）经济史中给予安全政策和军备问题更多的空间和余地，显然并非巧合。最终，使 1945 年具有了文明转折点特征的并非经济事实，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恐怖效应，它产生于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

再一次被提上经济史研究日程的核心是一直悬而未决的德国经济以及经济政策如何重新定位的问题。“经济奇迹”留下的遗产并不完全是积极的。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市场主体的无能，他们未能汲取“经济奇迹”时期的经验教训，从而导致推动德国重返知识生产和新经济领域先锋地位的努力归于失败。^① 他们缺少的并非理智和判断能力，而是放弃原先平静的发展道路、重新调整经济架构和运行规则的勇气和激情。许多人认为经济的传统组织方式已不再适用，而另一群人则从中发现确保德国保持贸易大国地位和市场竞争力的制度比较优势。显然，如今的改革之争已无法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它可以从 2007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汲取有益经验。而本书研究的首要目的和愿望正是为此创造事实基础。

经济史学家要想更清晰地见证时代历史而不至于走偏，一些特定的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当他们不想受制于事件编年史的束缚时更是如此。经济史学家希望借助问题导向型方法来解答读者提出的疑问，为避免草率行事，必须将历史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紧密结合起来。有关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决定和诸如货币改革、经济改革、马歇尔计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朝鲜危机、共同决策机制、扩充军备、能源政策、欧洲一体化、货币政策、对外贸易政策或国际经济利益均衡措施等重大事件（在此只列举最重要的一些事件）的分析可从对档案材料的深入研究中获得。此外，还可以使用来自联盟档案馆以及德国、美国 and 英国国家档案馆的相关材料。但以批判态度审视档案数据这种经典的历史研究方法在经济领域仅能有限地

^① 详见维尔纳·阿贝尔斯豪塞《德国工业的活力：德国走向新的经济道路与对美国的挑战》（Werner Abelshauser, *The Dynamics of German Industry. Germany's Path toward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American Challenge* New York, Oxford, 2005）。扩展和修订版见 Keizaibunka no tousou, Tokio, 2009，含 Akihiko Amemiya 撰写的后记。

使用。此外，大多数国家或联盟机构的库存档案对于 30 年以内的研究是不公开的。因此，今天研究德国历史所能使用的数据仅限于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此外，重要的存盘资料——特别是有关欧洲和世界政策的资料——设有一定的保密等级，通常一般的研究人员是不允许查阅的。如果至少能突破这两重限制的任意一个，对于研究工作而言都是令人欣慰的。因此，我一方面要特别感谢与波茨坦的军事历史研究局开展的研究合作。在研究局的帮助下我们才得以获取国家档案馆的相关存盘资料。另一方面也要感谢波恩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所属的社会民主档案馆的大力协助。通过那里找到的前联邦部长汉斯·马特霍夫的相关寄存物，我们才得以将施密特政府的有关资料引入研究中。在许多情况下，研究中引用的档案资料，其重要性和说服力已超出了其所诞生的时代，并对后世产生着深远影响。

从西德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我们还面临着一些其他问题：1945 年重大转折之后，对于西德经济而言，形成于西德经济的起始阶段和突破阶段的新运动规律是否一直适用？或者战后的特殊条件消失之后，联邦德国是否还将继续 20 世纪上半叶的趋势和循环？新的趋势——如经济金融化——在何种条件下产生并对当今的危机状态产生何种影响？对德国经济社会长期经济发展和组织模式的审视能否帮助我们对其现实状况做出比“二战”结束时更加恰如其分的确定？在这里不同的问题——一方面是关于经济与秩序政策的重大决定及其后果，另一方面是关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连续性——则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探究。

将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体系并入德国经济史的长期框架需要使用与历史分析不同的其他方法。档案数据恐怕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起不了多大作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例如经济增长理论、景气循环理论、分配理论、对外贸易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的运用比分析“重大决定”更重要，但是，其解释价值自然也必须经得起历史—经验主义的考验。通过对绝对趋势、运行周期和结构模式的宽视野观察，我们需要表明，将“二战”后的发展历程放到一个更加长久的框架内去评价可能更加适合。

在修改《德国战后经济史》一书过程中，我获得了众多同僚、档案管理员、图书管理员和研究人员的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来自比勒菲尔德的约阿辛·拉德考（Joachim Radkau）和古纳·施托贝格（Gunnar Stollberg）。感谢他们在孤独寂寥日子里对我的陪伴，感谢他们与比勒菲尔德其他历史社会学家的联络。此外，还要感谢特里斯坦·格雷芬（Tristan

Graefen) 和塞巴斯蒂安·柯纳克 (Sebastian Knake), 是他们不辞辛苦地为我整理经济史的相关数据, 搜寻参考文献, 修改插图和表格。感谢来自贝克出版社 (Beck-Verlag) 的塞巴斯蒂安·乌尔里希 (Sebastian Ulrich), 是他以百分之百的专业精神为我校审和管理手稿。在此, 我要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维尔纳·阿贝尔斯豪塞
于比勒菲尔德, 2010 年 11 月 24 日

译者序

从“新经济”走向“新经济”： 德国社会生产体系的连续性与变革

史世伟

2011年德国政府与工业界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首次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将通过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研发和使用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并宣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德国这一倡议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与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在过去的十年中，与其他工业国家相比，德国制造业的增加值一直稳定在较高的水平，即使在金融危机中也未遭受太大冲击。这主要归功于德国有适合制造业发展和保持其国际竞争力的生产体系与教育体系。正因为德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其工业4.0计划才受到这样的重视。根据“长波”理论，每隔一段时间出现的新技术集群是社会演化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①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大规模消费品生产的衰落引发了信息革命，半导体、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使经济增长重新获得了动力，但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全球经济发展表明，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服务型经济”无法带来足够的就业与增长，随之而来的制造业“空洞化”使许多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作为德国高科技战略的一部分，工业4.0是德国发挥自身技术与制度优势，应对国际国内挑战的重大举措。继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德国似乎又一次引领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这正是维尔纳·阿贝尔斯豪塞《德国战后经济史》的核心主题。

一 关于此著作的总体思路

维尔纳·阿贝尔斯豪塞（Werner Abelshauser）是著名德国经济史学家，他早年在曼海姆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学，后来转向经济史，曾任德国比勒菲尔

^① [英] 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沈宏亮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148页。

德大学经济与社会史讲席教授。目前他是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教授并与其他学者一道成立了比勒菲尔德全球社会研究所。阿贝尔斯豪塞教授的研究范围较广，包括战后“德国经济奇迹”原因、德国企业史、19世纪后期以来德国生产体系与方式以及欧洲一体化等。而这部鸿篇巨制洋洋洒洒，集其研究成果之大成。1983年出版后，在德国的影响逐渐提升，1996年，德国颇具影响的知识分子报纸《时代周刊》称其为德国经济史的“楷模（benchmark）之一”。其间，每次再版作者都对它进行扩展和修改。我的翻译主要根据作者2011年的修订版，它比2004年版增加了100多页。在我们得到版权许可后，作者还为中文版做了专门的修订。需要指出，商务印书馆曾经出版过本书第一版的中文译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年》，张连根、吴衡康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但是当年的版本只有四章（现在是十章），不仅时间跨度小、篇幅不及现在的一半，而且没有作者后加入的关于民主德国经济以及德国经济国际维度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内容。由于上述译本距今时间已较长，这次我在翻译中没有参考张、吴两位前辈的译文。

总体来看，《德国战后经济史》不是一部关于战后经济“重大事件”的编年史，而是一部对于德国经济模式及其影响的研究著作。作者试图在德国经济发展长期框架内审视德国经济与秩序政策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经济结构的连续性。作者深知，要完成这一挑战需要采用与历史分析不同的其他方法。档案数据恐怕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起不了多大作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例如经济增长理论、景气循环理论、分配理论、对外贸易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的运用比对“重大决定”进行分析更重要。但是，其解释价值自然也必须经得起历史—经验主义的考验。在这里，阿贝尔斯豪塞继承了德国经济学以欧肯为首的秩序自由主义传统，在方法论上对困惑了德国经济学半个世纪之久的理论思考方法与历史思考方法的“二律背反”给出了自己的答案。^①

当然，阿贝尔斯豪塞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最为关注的是历史的连续性。因此，他接受同样是经济史学家的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的观点，即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他认为德国的“社会生产体系”（*Soziales System der Produktion*）或称“社团主义市场经济”体

^① [德] 瓦尔特·欧肯：《经济政策的原则》，李道斌、冯兴元、史世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6页。

制 (Korporative Marktwirtschaft) 在威廉帝国时代奠基, 德国经济的创新核心是 19 世纪晚期在机械制造、电子技术工业或化工业领域形成的多样化优质生产, 它的实质在于利用经济与科学的新型共生关系实现无形价值的创造, 这种价值创造只是在边缘上来自与传统工业一致的物质转化。它更多地依赖于对市场需求、研发问题的解决方案、生产程序、应用程序和可加工性的整合认知以及有利于产品适时供给、融资和确保其他性质特点的整合型服务。这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已经成熟的“新经济” (neue Wirtschaft), 具备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新经济” (new economy) 的一些典型特征。当今世界经济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全球化。而 19 世纪最后 30 年在德国崛起的新工业充分体现着全球化的能量和活力, 世界市场导向策略和大规模的出口贸易正是其独特标志, 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世界经济动荡中断了这一进程。因此, 阿贝尔斯豪塞对德国经济模式或生产体系能够适应当前“新经济”的挑战具有十分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 工业革命的颠覆性特征不应被绝对化, 工业革命是人类知识和人力资本长期积累的结果。在德国, 与之相应的制度体系也在工业革命出现时得以建立, 以后不断完善。当然, 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并不是否认变革。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 历史与现实及其未来通过制度联系起来,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意味着社会与经济制度沿着一条历史上自发或情境依存选定的轨道演进, 它不仅成为选择的限制, 也为未来的发展指出方向。^① 由此, 不难解释为什么作者在一共十章的《德国战后经济史》中用整整一章来回顾 1870—1945 年的德国经济史 (这也是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没有的)。

作品其余九章对于德国战后经济不同时期的篇幅分配也别具匠心。第二、第三、第四章是 1945 年至 1969 年的德国经济史, 重点在 1947—1958 年的德国经济。第五章是德国经济的国际维度, 特别是欧洲一体化对德国经济的影响。第六、七、八章是 1970—1979 年的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第九章回顾了 1990 年统一前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而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长达 30 年的经济史仅仅用第十章一章的篇幅。诚然, 一部历史著作的写作受到历史档案材料的限制, 大多数国家或联盟机构的库存档案对于 30 年以内的研究是不公开的。因此, 今天研究德国历史所能使用的数据仅限于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但是在我看来, 这还不是作者篇幅取舍的全部原因。1947—

^① Douglass D.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et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vii.

1958 年与 20 世纪 70 年代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即德国战后秩序政策形成与转变的两个关键时期，自然成为作者的论述重点。而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根源和欧洲一体化的经济效应正是作者最有成果的研究领域。

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下面我就以上这三个方面对著作的主要创新点进行较为详细的评价。

二 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德国“经济奇迹”原因的解释

在德国经济史学界，阿贝尔斯豪塞最突出的贡献是其对德国战后“经济奇迹”根源的独特解释。以往人们——包括德国史学界中的一些权威人士——的习惯看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德国沦为一片焦土，同时也彻底地摧毁了德国经济与政治统治基础，战后的德国处于“零起点”。然而，阿贝尔斯豪塞却指出，“从总体上看，不论是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还是两德重新统一后的德国都保留了经济发展的连续性。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联邦德国的经济史注定不会从零点开始”。“德国经济于 1945 年崩溃且涣散了，但德国根本不是一个‘欠发达’国家。”

阿贝尔斯豪塞之所以能够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是他坚持从一个长期的框架内对德国 1945 年后经济史进行诠释，另一方面也在于他对 1945—1948 年即所谓重建前时期史料的深入挖掘，他对于德国著名企业历史的研究也有助于他了解德国当时的资源状况。他用数据证明，1945 年德国的工业能力并没有被摧毁，生产设备也没有老化与落后，以往的研究夸大了战争轰炸以及战后盟军对于德国工业设备拆卸的影响。实际上，1945 年工业设备投资的数目相当可观，而投资的质量也不错。“二战”末期，德国的质量等级——即净生产资产与毛生产资产之比——达到“一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的战后重建既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始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的 1949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在 1949 年成立），也不像许多历史学家断言的开始于货币改革的 1948 年，而是开始于 1947 年。

读者不禁要问，重建从哪一年开始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吗？是的，对德国战后所谓的“经济奇迹”的解释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所谓德国战后“经济奇迹”指的是 1948 年德意志联邦德国成立，经过一段困难时期后，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1950—1965 年，德国人均产值平均增长了 5.6%，其中 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内产值的年均增长更是高达 8% 左右。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同期的平均水平。德国史学界对于“二战”后德国经济史的研究始